

#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龚和平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始终独立地抗击日本法西斯,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钳制和消耗了日本军队大量兵力,阻止和迟滞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与希特勒会师中东的战略计划,配合和援助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作为五大参战国之一,同法西斯集团中的第二号强国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8年之久的艰苦斗争。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为最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发挥了何种程度的作用?正确而公允地论证这个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略谈几点看法。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野心是很大的。早在本世纪20年代,它就策划“利用中国的富源”,“和赤俄发生冲突”,“与美国一战”。鉴于这种征服世界的狂妄企图,1931年9月,日本公然践踏《九国公约》,侵占中国东北,因为“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线。”<sup>①</sup>日本的军事行动,加剧了同苏、美之间的矛盾,遭到了苏美两国的谴责和反对。由于和苏美矛盾的加剧,1936年6月,日本修改《帝国国防计划》,把苏、美并列为第一“假想敌国”。同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和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为此,要充实陆军军备,使其“与苏联在远东能使用的兵力相对抗”,在同苏联开战初期,“能给予打击”;要加强海军军备,“使其能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sup>②</sup>1937年初夏,日本又拟定了5年军备计划和5年生产力扩充计划,以增强军事实力,便于参加世界大战,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的上述计划,是同轻视中国的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身为日本陆相的杉山元竟向天皇保证,侵华战争“可以在一月之内完全结束”,陆军省的其它幕僚也几乎都认为:“一个不可能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示一下强硬态度,中国立即就会屈服。”<sup>③</sup>由此可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决策中,“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攫取丰富的战争资源,取得强国的战略支点,然后再“南进”或“北进”,这是一个最便当、最理想的方案。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显然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中日战争一开始，日本侵略者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芦沟桥抗战中，中国29军“不惜牺牲，奋勇冲锋”，甚至“以大刀队摸营，和敌人实行白刃战，歼敌颇多”，同时，芦沟桥附近的铁路工人冒着枪林弹雨，搜集大批铁轨、枕木帮助军队构筑防御工事；农民群众也积极支援29军，一些青壮年主动帮助军队修路、送情报、运送弹药物资，甚至连7、8岁的小孩也端着水盆供士兵磨刀。长城内外，形成了军民共同抗日的热潮，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力量。平型关大战，我八路军又歼灭日本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千余人，戳穿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扫抗战以来的失败主义空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淞沪战役中，日军调集海陆空军20余万，飞机300架，军舰150艘，向上海中国守军发起猛攻。中国当局调集各路大军驰援上海，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配合下，往返冲杀，英勇奋战达3月之久，使日军伤亡达4万之众。到1937年底，日本一共向中国战场派遣了16个师团，约60余万人，相当于陆军总兵力（95万人）的2/3。

1938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南北战场的联系，进一步控制中原和华中，分南北两路夹击徐州。但台儿庄一战，我国军队在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垒石为堡，浴血奋战，一举歼灭日军两万余人，号称日军精锐之师的矶谷师团的大部分和板垣师团的一部分在此役中被歼灭。

日军全面侵华不到一年，伤亡之大，为其侵略战争史上所未有。中国的有力抵抗，陷日本帝国主义于泥沼之中，使其“南进”、“北进”计划严重受阻。为了尽快摆脱困境，日本侵略者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集中国力”，加速其战争机器的运转，阴谋“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同年秋天，日军发动了武汉战役。在汉口作战中，日军投入兵力近38万人，这是在整个中日战争中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sup>④</sup>。针对日军的军事行动，中国国民党军事当局调集李宗仁、陈诚等部一百多个师的兵力沿长江两岸保卫武汉。敌我双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会战，历时三个多月，损失都比较惨重。中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对日军进行了有力抵抗。据日方统计，仅参加武汉战役的日军第二、第十一军在作战中损伤即达31000多人。10月25日，在日军多路围攻、武汉已是孤城难守的情况下，为保存军力，中国军队退出武汉。武汉虽为日军所占领，但国共既未分裂，中国也未投降。相反，由于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迫使仅有的侵华军队摆在漫长的战线上，而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又严重地威胁着侵华日军的后方。

1939年至1941年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的时期。在西线，德国法西斯相继占领了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等14个国家。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挟持着半个欧洲的人力和资财，背信弃义，未经宣战，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德国法西斯的肆意侵略，不仅给苏联、法国，而且也给英国、美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独立、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为了保持自己的主权和生存，英、法、苏先后对德宣战。就世界而论，反法西斯力量开始壮大起来。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法国迅速败阵，而英、苏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战略防御的态势。日本帝国主义目睹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急切希望尽早从中国战场脱身，以便伙同它的欧洲盟友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于是，它采取了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的两手策略，逼迫中国早日投降。但是，已经觉醒了的中华民族既没有被日军的军事进攻所吓倒，也没有受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诱降所欺骗。相反，中国正面战场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对日军发起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在华南，国民党于南宁地区集结了以杜聿明第五军为主力的15万人，12月中旬，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攻击日军，击毙敌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给日军以重大打击。在华中，中国军队集中七、八十个师的兵力对日军发动进攻，经过40余天的战

斗，打死打伤日军8300多人。在华北，傅作义将军指挥的国民党第35军反攻包头，收复五原，全歼敌五原特务机关。正面战场的这次“冬季攻势”，引起日本方面的震惊。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说：“摧毁敌之抗战意志是难上加难。依靠建立及加强新政权、进行宣传谋略、阻止和断绝第三国援蒋等，虽然是必要的，但若不配合战略进攻，以上办法之效果是非常缓慢的。”<sup>⑤</sup>随后，中国正面战场又相继进行了宜昌会战、南昌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总之，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面战场先后发动五次会战，对打击日军的进攻，支持全国抗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敌后战场，1939年，日本华北方面军计有3个军，共辖12个师团，8个独立混成旅团，占入侵关内日军的半数以上。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仅自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的三年间，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敌作战20106次，敌人虽然不断进行灭绝人性的残酷“扫荡”，实行“三光”政策，但根本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经过“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其实力也越来越强大。到抗战四周年之际，日军不得不承认，在占领区内“日军和共军的势力大致相等，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约有全面积的10%可以看作治安区。中共势力圈内，约有30%的中心根据地，是日本不能插手的地区。剩下的60%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带。”

总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人民始终独立地抗击着日本法西斯，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打乱了它的战略部署，使其欲进无力，欲退不能。中国人民在这一阶段的抗日战争中，不仅对于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否则，百万日本大军在征服中国之后，或北进，或南下，都有极大的选择自由，世界人民在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中将会付出更多、更沉重的代价。

## 二

日本帝国主义欲壑难填，侵占中国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它的狂妄企图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即把侵略中国作为称霸世界的第一步。但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止，中国战场始终牵制着日本陆军的主力，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由于中国战场的这种作用，有力地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大陆，进而征服全世界的野心，从而配合和援助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时间里，日本陆军主力始终用于中国战场。据日本资料统计，“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原有陆军17个师团（不含台湾军及非步兵师团）。战争发动后，日本迅速扩军，增编了7个师团，合计24个师团（不含台湾军及非步兵师团）。其中部署于国内2个师团，朝鲜1个师团，部署于中国东北5个师团，华北、华中16个师团。总计投入侵华战争21个师团，占其陆军总兵力的87%以上。<sup>⑥</sup>

1937年底，日军占领了南京、杭州、滁县、济南以后，由于兵力不足，大本营曾一度主张不扩大作战区域，集中力量“讨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战场的军队，巩固已占领的地区，以便尔后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但是，这一主张遭到陆军部和侵华日军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必须双管齐下，一面“扫荡”占领区内的抗日军民，建立伪政权；一面继续向前方进攻，消灭集中在徐州、武汉、广州等地的中国军队主力，扶植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以便尽快

征服中国，解决“中国事变”。经过争论，大本营批准了陆军部和侵华日军的意见，并从1938年初开始调整侵华日军的部署。根据新调整的战略部署，侵华日军于1938年初至5月进行了“徐州作战”。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并打通了津浦铁路。日军占领徐州后，侵略气焰更为嚣张，大本营将原定1939年攻占武汉、广州的作战提前到1938年秋进行，企图通过攻占武汉、广州，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中枢，迫蒋投降，以结束侵略中国的战争。为此，1938年6月18日，大本营下达准备汉口作战的命令。24日，日本政府决定了“集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作为今后处理中国事变的指导方针。<sup>⑦</sup>7月8日，日本政府又进一步决定：举国家一切力量用于攻取武汉、广州的作战。为贯彻上述方针和决策，日本又增设了10个师团，总计兵力达到34个师团。除1个师团（近卫师团）留在本土，1个师团侵占朝鲜外，其余全部投入中国战场，占陆军总兵力的94%以上。真可谓倾巢出动！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投入了大量兵力，但对华战争仍然陷入相持不下的局面。1939年，日本从世界战略考虑，不得不对其军备作出新的调整。其主要变动是增加华北的兵力用以进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大量增编警备专用的三单位制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1940年后，入侵关内的日本陆军占陆军总兵力的百分比虽然有所下降，但由于中国战场日益扩大，实际入侵中国的日军兵力，仍然在逐年增加。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其在中国大陆仍驻有110万左右的军队，这个数目超过了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总和，大约相当于全部海外日军（不包括关东军）的1/2。<sup>⑧</sup>

日本大举侵华，用于中国战场的战争费用也是极为庞大的。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岁出逐年增加，1936年度总岁出为22.82亿元，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总岁出则达到117.42亿元。岁出的主要项目是军费。1937年军费支出33.71亿元，1938年增至59.62亿元，1939年再增至61.56亿元，在岁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分别为68.9%、73.3%、68.5%。<sup>⑨</sup>1940年之后由于陆军中央部的方案是转入长期战，军费支出才有所削减。总之，自“七、七”事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华军费总额至少超过213亿元，占同期总军费的70%，总岁出的47.2%。

由此可见，日本在中国战场倾注了大量的兵力和战费。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预谋并未实现。相反，经过中国人民的8年艰苦抗战，以及大小几十万次战斗的打击，日军已是狼狈不堪了。8年累计，日军在中国损失44.7万人，其中陆军战死38万人，这个伤亡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死日军总数113万的39%。相比之下，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的兵力只有31万人。从以上的事实和数据不难看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消灭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支柱——日本陆军方面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中国战场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对世界人民的法西斯战争也起了很重要的配合作用。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曾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盟国，作出了伟大的努力”。<sup>⑩</sup>

### 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将日军（特别是陆军）的主要力量吸引到中国战场，并消耗了其大量兵力。因此，促使日本既无力北攻苏联，又迟滞了南进太平洋的步伐，同时更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不足，不能全力以赴。这些对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战略掩护和援助作用。

第一，钳制和消耗了日本大量兵力，使其不能北攻苏联

众所周知，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社会主义苏联的仇恨是由来已久和根深蒂固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本身也包藏着北进苏联的图谋，正如东条英机在1937年6月9日所说：“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sup>①</sup>。只是由于“中华民族抗战坚决，日本从中国抽不回来”<sup>②</sup>，才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丧失了对苏作战的信心”<sup>③</sup>。这个问题可从下面几个方面略作证明。

首先是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1938年7月14日，日本侵略军在中苏东部边境张鼓峰挑起事件，事件发生后，苏联军队给日军以有力的痛击，日军遭到惨重的失败。日军的失败固然由于苏联红军的强大，但也和日军主力正在准备进行武汉战役、深陷中国战场有关。1938年，日本在中国长城以南的兵力为24个师团，占总兵力34个师团的70%。张鼓峰事件爆发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只不过6个师团，面对多达二十几个师的远东苏军，显然处于劣势。1938年8月，正在张鼓峰作战的日军向东京大本营告急，要求给予援助。但此时武汉战役日军先后动用12个师团的兵力，占关内日军总数的一半。显然，日本大本营要派兵出关支援张鼓峰作战是很困难的。同时，张鼓峰作战的日军向大本营要求供给反坦克弹药，但被陆军省予以驳回，因为当年11月的弹药生产额都已经分配给武汉战役了。<sup>④</sup>

张鼓峰事件之后，日苏间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特别是在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满洲国”与蒙古的边界纠纷中经常导致日苏之间的小范围冲突。对此，日本陆军在攻占武汉后，主张停止对中国的进攻，采取长期持久作战的态势，而集中全力充实对苏战备的方针。但参谋本部害怕在对苏战备尚不充分的时期内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因此对关东军下达了“绝对不要理会边界纠纷”的根本方针。可是，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却对下属的防卫司令官发布《满苏边境纠纷处理要纲》，指示要对苏蒙军队的“不法行为”予以“彻底惩罚”。<sup>⑤</sup>由于日本关东军的蛮横无理和挑衅行为，1939年5月11日，日苏之间又爆发了诺门坎事件。在三个多月的战斗中，日军“包括死伤、失踪和战病的人员在内，牺牲达两万人之多。主力军第23师团等死伤率近8成，遭到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打击”<sup>⑥</sup>。参谋本部唯恐关东军独断专行和陆军部的姑息纵容而发展成为正式的对苏战争。8月30日，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亲自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下达大陆命令第343号，指示：“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分在满洲防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为此在诺门坎尽力不扩大作战，筹划迅速结束之。”<sup>⑦</sup>究其日军失利的原因，主要是：1. 日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因而只能以单薄的兵力同苏军作战，在数量上处于劣势；2. 长期侵华战争耗费了大量的资财，同苏军相比，在现代装备上差距显著。

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苏联的对华政策和策略。从1932年开始，日本陆军，特别是关东军，明确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直到1940年，日本陆军每年都要制定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作战计划。1940年之后，虽然日本南进体制转变，但北进是暂时放弃，而并未完全放弃。根据这种情况，苏联敏锐地觉察到对其远东地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因此一方面保存远东地区的必要防务，另一方面则决定采用援助中国的办法来钳制日本可能存在的北进行动。为此，1940年秋，苏联决定派出以瓦·崔可夫为首的军事代表团来中国。临行前，斯大林指示：“你们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sup>⑧</sup>

再次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统治集团对解决中国事变和北进苏联的争议。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对此，日本在政策上陷入极大的被动。这时，日本在战略上有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武力南进；二是北进，配合德国，进攻苏联；三是维持现状，待机而动。为了选择行动方案，从6月25日到7月1日，日本内阁和大本营连续召开了6次联席会议。讨论中，外相松冈洋右力主先北进后南进。陆相东条英机认为，不能置中国事变于不顾。参谋总长杉山元说：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办不到。7月2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正式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从南方各地采取种种步骤以加强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暂不介入德苏战争”。<sup>①</sup>苏联得到日本放弃北进的情报后，便从其远东军中调出8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师及空军部队到西线，在关键时刻支援了莫斯科保卫战。

第二，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兵力不足，不能全力以赴

1940年夏天，德国单独发动对英、法的闪击战。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打败了法国，英国损失也相当惨重，同时还相继侵占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得手后，又力促其盟友日本南下太平洋。德国驻日本大使奥托受其政府的命令通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德国政府“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问题不感兴趣”，力促日本“南进”。1940年7月16日，日本陆军、海军、外务省的代表一致认为：日本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包括一方是东印度和缅甸，他方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整个地区。但是，狂妄的贪婪，并不等于具有了相应的军事力量。正如日本参谋次长泽田所说：“日本的国力因投入中国事变而余力不足。靠自己解决南方问题，实不可设想。”<sup>②</sup>因此，日本南进“完全取决于中日战争的情势”。

1940年7月，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必须紧张起来，把自己变成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的核心”。毛泽东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sup>③</sup>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于8月20日发动了“百团大战”。战斗持续三个多月，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俘获日军281人，日军投诚47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极大地破坏了日军控制下的交通设施及能源基地。这次战役的发动和胜利轰动了中国和世界。

由于日本军备计划被中国抗战所阻滞，陆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又伤亡惨重，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推迟太平洋战争的发动。这显然对缓和当时英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处境是有益的，也为美国加强战备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战争初期，英、美、荷等国军队节节败退。日本海军在取得初步胜利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企图进一步调兵遣将，东攻澳大利亚，切断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系；西攻锡兰和印度洋，与德国在中东会师。此时德国法西斯也正盼望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如果日本切断了英国经红海到埃及的交通线，就将十分有利于德军“隆美尔非洲兵团”的挺进。日本海军的这一计划如果得不到陆军的支持是很难实现的，而此时的日本陆军主力陷在中国大陆，要再调动庞大的兵力配合海军完成上述计划，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1942年2月，中国根据英国等盟国的要求，组建了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的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从而牵制了在南亚地区的部分日军主力，这样就使得日军向西线作战、企图与德军会师于中东的计划更快破产。由此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在太平洋和南亚地区处境十分被动，但由于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使得日本侵略者既无力也无心履行德、意、日军事盟约。

### 第三，中国抗日战争为英美与苏联保持了重要的战略通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于受到中国战场的牵制，没有能力冲进中东地区，这就使由伊朗入里海，直通苏联中心地带的交通要道畅通无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条要道的运输量，超过北大西洋海路。日本因中国战场的牵制而无力履行德、意、日夹攻苏联的军事盟约，<sup>①</sup>所以日苏之间一直不存在战争状态（指1945年8月14日前）。这样，不仅苏联货船，而且大量美国商船，也改挂苏联国旗，在太平洋进行安全的航运。据统计，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大战结束，英、美、加拿大各国向苏联提供了1714万吨各种物资，而其中1220万吨是通过这条通道运抵苏联的，占总吨位的71%。这样，英、美、苏各盟国间，不仅军事上可以东西呼应，而在战略物资上也紧密结合起来。这对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是十分有益的。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在8年的抗日战争中，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陆军和大量海、空军，并以高昂的代价消耗着日本的实力，从而打乱了日本的侵略部署，使其北进苏联的计划陷入破产，阻滞了南进太平洋的步伐，并使日本迅速征服中国后与德国会师的阴谋付之东流，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它地区的反法西斯斗争。无可否认，中国抗日战争确实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友人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衷心感谢和永远不忘的。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的贡献，中华民族为维护世界和平所起的伟大作用，同样也是世界人民所永远记取的。

#### 注释：

- ① 《现代史资料7·满州事变》，三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144页。
- ② 《现代史资料8·中日战争1》，三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361页。
- ③ 武藤章：《军务局长武藤章回想录》，1981年东京版，第97页。
- ④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1972年东京版，第292—293页。
- ⑤ 井本熊男：《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日文版，第341页。
- ⑥ 耿成宽：《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 ⑦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9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389页。
- ⑧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1971年东京第8版，第1006—1007页。
- ⑨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36页。
- ⑩ 《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二版，第三卷，第1033页。
- ⑪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1961年版，第333页。
- ⑫ 井上清：《日本历史》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96—897页。
- ⑬ 角田顺：《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1》，水菴书房1973年日文版《资料解说》，第16—17页。
- ⑭ 库克斯：《中国与日本》，圣巴巴拉1978年版，第310页。
- ⑮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40页。
- ⑯ 《战史丛书·关东军》，朝云新闻社，1970年，1，第713页。
- ⑰ 角田顺解说：《现代史资料》东京1964年版，第10卷，第141页。
- ⑱ 瓦·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 ⑲ 《现代史资料35·太平洋战争2》，三铃书房1978年东京版，第121页。
- ⑳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280—281页。
- ㉑ 《毛泽东选集》1991年6月第二版，第2卷，第761页。